

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官僚资本主义进程的说明

秘鲁人民运动（重组委员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

目录

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官僚资本主义进程的说明	1
认识官僚资本主义对民主革命必不可少	2
垄断同盟和帝国主义国家对被压迫国家统治的加强	6
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主义和反革命计划	9
（一）拉美官僚资本主义发展的三条路线、三个需求和三项 反动任务	10
（二）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计划、被压迫国家间的争端与鼓 励中国复辟	13
外国直接投资形式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输出占据更重要地位 ..	14
东南亚国家从殖民地转变为半殖民地：未完成的革命	19
这个问题的经济本质是什么？	22
南朝鲜和台湾地区的典型案例	23
南朝鲜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的角色	23
在大垄断企业与国家干预基础上的发展	25
作为帝国主义在该地区资本再输出基地的南朝鲜	26
南朝鲜的“开放”进程由大资产阶级的买办派领导	27
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对南朝鲜的更大统治	28

台湾地区的例子：外国直接投资与所谓的“技术转移”	32
技术转让和一揽子外国直接投资	42
台湾地区：另一条“亚洲四小龙”	44
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对这一过程的整体认识	46
注释：	58

按：本文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初次发表，2016 年以西班牙文发表于国际理论杂志 **《毛主义者》第一期**，所有注释均为作者所加。本文为英译本转译而来，并参考了西班牙文，因此，由此产生的任何错误只应由译者承担。

认识官僚资本主义对民主革命必不可少

作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洛思想的拥护者，我们在讨论官僚资本主义时，是从帝国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出发的：即它是寄生性的和腐朽的垄断资本主义。根据列宁，“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是金融资本产生的；“.....（首先）垄断同盟瓜分国内市场，然后在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直接瓜分世界市场。”[1]

在这方面，大多数帝国主义的不同代表与它的修正主义仆人——试图用最不同的形式掩盖世界经济发展的经济本质——不断地重复帝国主义关于“全球化”的益处和“发展中国家”（countries）（他们对被压迫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的称呼）“市场、世界贸易及外国投资的自由化”的原因的宣传。他们称赞“新兴国家”在世界贸易参与中的增

长——因 2008 年开始的世界经济长期衰退而终结的增长。这忽视了到底是谁从这种增长中获益，所谓的“新兴国家”贸易的增长是**各垄断同盟**为了市场而用不同形式的**资本输出**进行斗争所驱动的。这种增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解决第三世界国家（countries）在帝国主义压迫、半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手中遭受的剥削和落后。

在秘鲁，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ROL）的老鼠们说秘鲁社会现在是资本主义的。但是，正如我们将进一步看到的，我们有着全球增长，包括了被压迫国家（countries）的商业，而这是由帝国主义资本输出（更大的投机和银行间贷款、投资基金、大垄断者的所谓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通过其他形式的帝国主义资本渗透到“经济领土”即市场的斗争）在帝国主义国家（不平等的发展规律）和被压迫国家（金融资本的市场，他们的商品出口市场，原材料与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增长所推动的。

其他投资形式包括许可证和其他所有无形或有形资产从外国公司转移到被压迫国家公司的方式。他们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了从属于帝国主义内部市场的纽带（帝国主义垄断者所谓的“垂直整合”或“全球价值链”是帝国主义垄断者与官僚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者——他们自己产生的垄断——同盟的其他形式）。在资产负债表中，它们表现为通过技术转让“向国外支付的财产”，用于支付许可和特许权使用费。他们不会表现为投资获益或直接再投资。

同样地，不应忘记帝国主义资本的投资也采取“援助”的形式（例如，德国国家官方认为“发展援助”是促进其资本和商品输出的一种不

可或缺的方式）。因此，这种“增长”意味着被压迫国家带去更多的落后、压迫和暴力。数据十分清楚：从 1990 年到 2008 年，世界贸易增长超过了世界 GDP 的增长。为什么？因为这种“增长”的大多数仅仅是零部件贸易或输入，其最终产品的生产是在触角遍及世界各地的所谓跨国或多国企业(TNEs/MNEs)内进行的。资产阶级学者会说，它们是在所谓的“全球价值化链条（GVCs）”上的“国际层面的垂直结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其他帝国主义国际组织说，这种增长是由跨国公司提供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在我们国家（country）推动的。[2]

这实际上是金融资本积累的进一步的发展，并且是大的帝国主义垄断家和金融寡头的资本积聚和集中。换句话说，这是“参与制”（列宁）的进一步的发展，手段是以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输出资本来建立海外子公司，这些子公司的最典型形态是“血汗工厂”，或最终产品（输出）的组装车间。

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的这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童话。在这种童话里，据说所有国家都紧密联系成一个单一的生产体系。正如我们之前引用的经合组织（OECD）、世贸组织和其他组织的报告提到的，帝国主义者是自相矛盾的。这些报告认为创建一个单一的“全球生产网络”是一个“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3]

我们驳斥和拒绝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观点，因为它认为在我们各国发生的事情是“原始的资本积累”——就好像压迫我们越来越甚、发

现自己处在完全崩溃中的帝国主义会允许我们各国自主和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和现实截然相反。

因掠夺我们各国中的农民和工人群众而积累的财富、生产工具、生命力和劳动力，没有落到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小资产阶级手上。相反，这种掠夺为更大的资本积累和集中服务，而落在了一小撮帝国主义金融资产阶级与一小撮官僚、买办和封建资本的吸血虫手上。

在第三世界国家，广大群众陷入贫困，一无所有，找不到工作，在城市中变得越来越多，产生了更多的罪犯和流浪者。所有这些都是压迫我们的人民和阻碍我们各国的发展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结果。因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宣称的所谓“原始积累”只是修正主义者的毒药，证明了他们放弃了反动人民战争来完成民主革命，从而向帝国主义和秘鲁反动派投降。

这些垄断同盟——不是被压迫国家——是这种经济增长的真正受益者。“在世界 GDP 中的百分比显著增长，从 1990 年占世界总产值的 16%（再次达到在 1913 年达到的百分比峰值的年份，我们的注解），到 2008 年（2009 年世界贸易危机全面影响的前一年）占世界总产值的 27%。”[4]

这些帝国主义垄断同盟（跨国公司）已经重新瓜分了世界。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 2010 年世界投资报告，从 1990 年到 2008 年，这些跨国公司的“销售额从六万亿美元增加到三十一万亿多美元，即增加了五倍以上”。跨国公司的资本增加了 1100%， “即在 2008 年约

有七十二万亿，雇佣了约七千二百万名工人”[5]。这个报告估计：“最大的五百家跨国公司现在的世界贸易参与率大约是 70%。”

这样，大垄断同盟通过投资来直接瓜分了世界贸易的销售额和利润。这些跨国公司属于一小撮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中国、意大利、俄罗斯、荷兰、瑞典、瑞士等。这些是获利份额最大的国家，我们在后面讨论帝国主义冲突的经济基础时会看到。

不要再简单地用“新兴国家”来概括我们了。没有这种国度。今天的国度包括少数压迫国家和占绝大多数的被压迫国家。

垄断同盟和帝国主义国家对被压迫国家统治的加强

垄断同盟之间争夺世界势力范围的瓜分斗争从二战以来变得越来越尖锐了。这些垄断同盟通常能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的帮助，越来越多地渗透到被压迫国家（即第三世界）的经济中。

几乎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殖民统治者手中赢得了独立，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成为了拥有形式主权的政治上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仍作为殖民地经济保留在世界范围内，这意味着它们受制于世界市场——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垄断统治，根据他们自身的利益和需要进行操纵。

当政治发生变化时，殖民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却保留了下来；民主革命没有进行到底，原因是在多数案例里这场革命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没有共产党形式的无产阶级领导，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无法

完成，这既是因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无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因为我们各国缺少能够成为“国民经济生活的老大”（马利亚特吉）的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无法自己形成）。结果，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都仍待解决。因此，屈从于地主和帝国主义利益的大量的中间资产阶级是这些国度的掌权阶级。于是，被压迫国家从殖民地变成半殖民地，官僚资本主义在半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就像我们在讨论东南亚国度时会看到的。

在一些案例里，它们从被某个殖民地政权统治变为了主要被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统治；在另一些案例里，旧的殖民地政权变为了主要统治新独立国家的帝国主义政权。这不是某些人声称的“新的殖民主义形式”或“新殖民主义”的问题。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表现为：贷款、援助、技术转让、外国直接投资等经济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IADB）、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明爱会（CARITAS）、非政府组织、经合组织（OECD）、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UNTAC）、世贸组织等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国际组织；或代理人战争。

各垄断同盟在第三世界的扩张展现了帝国主义资本渗透的发展是如何进行的。世界范围内，垄断联盟母公司的子公司的成长非常迅速；1946 年到 1961 年设立 3550 个新的子公司（附属公司）；根据联合国数据，1961 年到 1996 年则是 260000 个。库尔特·许布纳在一次调查中[6]得出的结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代表着商业中心的总部，同时，第三世界以及中东欧经济体则是各子公司的总部。”

这样，帝国主义在我们各国产生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从属于帝国主义利益的资本主义，因而阻碍了真正的民族发展——这是说，它是官僚资本主义。

关于帝国主义各国在被压迫国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实施的统治，列宁说：

“在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已经结束了极少数国家对世界的分割，其中每个国家现在都剥削着（指吸取超额利润）‘全世界’的一部分，而所剥削的每一部分都要比英国在 1858 年剥削的小一点；每一个国家都由于托拉斯、卡特尔、金融资本以及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关系等等而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每个国家都在相当程度上拥有殖民地垄断权。”^[7]

这就是这个问题的经济本质。帝国主义国家从被压迫国家吸取超额利润；虽然各被压迫国家在名义上者政治独立或拥有形式主权，但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还是能如此行事或“在相当程度上拥有殖民地垄断权”。列宁找到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阶段的殖民主义的相似之处。

毛主义不采用“新殖民主义”的说法。尽管一些人认为中共在“大论战”中的一份信《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中使用了这个术语；但是毛主席没有使用这个术语。在这封信中，他们也谴责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企图否认殖民地问题和帝国主义对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压迫的存在，也就是否认了由共产主义者来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必要性。这些人试图把这个术语作为正当的毛主义术语，来反对

这个问题的经济本质，否定用人民战争来实现民主革命的需要。我们会在后面再来讨论这个话题。

因此，让我们简要回顾帝国主义者是如何实施他们的计划来保持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压迫和在相互斗争中争夺霸权的。让我们简要回顾与此对应的被压迫国家（主要是亚洲的）的经济发展的历史。当条件被满足时——当它们与邓小平修正主义在中国的反共政变相遇——美帝国主义扩大了霸权主义经济计划的应用范围，它已经得到实施，目标是促进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主义和反革命计划

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了帝国主义霸权大国，因地制宜地在落后国家的农业中推行地主道路，从而使美国资本能够在农村地区更大的渗透。这条演化道路是旧式地主财产集中的新模式，因而也是农奴制在新形式下的继续。为此，美帝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起了所谓的“绿色革命”。美帝国主义者把自己的“技术人员”派往各国来宣传这项计划的好处，他们推动设立了农业部门和青年农民的“农业俱乐部”。然后，他们通过政府推动了农业法，傲慢地为此贴上了“农业改革”的标签，但实际上只是在农村地区推行地主道路的农业措施。因此，土地问题——表现为保留大庄园主和新型农奴制的存在——没有解决，结果是加强和翻新了世界各地广大农民群众受到的剥削和赤贫。

（一）拉美官僚资本主义发展的三条路线、三个需求和三项反动任务

1972 年，贡萨罗主席领导的秘共红色派，在《人民之声》上的“人民信息中心”，发表了对法西斯军政府当局的“1971-75 年全国发展计划”的分析。该分析确定了反对这个帝国主义计划（为人熟知的“进步联盟纲领”）的明确立场。分析指出：

“这是秘鲁和拉美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进步联盟的纲领（我们的注解，《埃斯特角宪章》）鉴于古巴革命的影响，提议重建拉美社会，来作为预料中的革命爆发的预防措施。重要的是回顾该联盟的提议，来理解我们国家正经历的进程。

“《埃斯特角宪章》在序言中提议，美洲各共和国协力合作来‘带给各国人民更快速的经济进步和更广泛的社会正义，尊重人的尊严和政治自由’，在它规定的发展目标中提出：‘用于投资的资源应占据国民生产的较大一部分’。它也提议：‘加快合理的工业化进程来增加经济的总体生产力，充分利用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产能和服务。在这个工业化进程中，会重点关注资本产品生产行业的建设和发展。’与此问题相关，它提议：‘确保工人享有公平的薪酬和适当的工作条件；建立有效的工人-雇主关系体系和程序，以便当局、雇主协会和工人组织进行协商和合作，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农业问题上，它提议：‘按照各国特点，推动全面的土地改革计划，目的在于必要时有效改变土地开发和保有权的结构和不公平制度，以使用公平的财产制度取代大庄园和小庄园的统治……’，建立“农民合作社和协会，和社

区发展计划。’关于教育，它提议：‘消除文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扩大规模和现代化；提高理论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的能力，加快培养迅速发展的社会需要的技术人员。’”(下划线来自《人民之声》的原文。)

最后，关于经济一体化，它提议：“扩大当前的拉美各国市场，作为加快这个大陆经济发展进程的必不可缺的条件，和通过工业专门化和互补获得更高生产力的适当手段.....这个扩大了的市场将会允许更好地利用进步联盟计划的各种资源。”

正如在《人民之声》上涉及《埃斯特角宪章》的引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的，这个反革命的和霸权主义的计划试图阻止革命，谋求通过所谓的“土地改革计划”（更准确的说是“土地改革法”，其性质和结果都很清楚）来消除革命的农民基础。它的经济目标是进一步帮助资本渗透拉美乡村地区。由于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的建立，需要“‘加快合理的工业化进程...重点关注资本产品生产行业的建设和发展’，以便尝试在拉美国家这样的被压迫国家中培育依赖性的工业化，从而屈服于帝国利益（官僚资本主义）。”

关于经济一体化的部分清晰的提出，帝国主义需要通过建立子公司或“关联”公司（帝国主义国家的母公司、跨国公司；被压迫国家的子公司：次级公司、再次级公司等），来发展“工业专门化和互补”和经济规模，来增加资本和商品的输出。这些做法就是日后众所周知的“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或“国际生产分割”。

这是帝国主义垄断集团对被压迫国家统治的最主要形式。帝国主义因贸易协定和共同市场而获利更多。这表现在区域内贸易的增长上，如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各国。因此，它不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表现，而是当地资本主义屈服于帝国主义的表现，对应着帝国主义资本争夺外部市场的斗争的需要。这种需要受到了资本主义体系自身危机，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危机的驱动。这危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在加深，激化了所有的矛盾。

因此，金融资本从其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海外国家收割的股息不断地增加——正如列宁在二十世纪初对日本的研究中已经观察到的。作为帝国主义矛盾尖锐化的后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尾声和之后的岁月里，美帝国主义开始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拉美各国的工业和金融计划失败了，在那之后开始受到重新评估。”（引自上文提到的《人民之声》的文章）

《埃斯特角宪章》的引文规定了官僚资本主义在农业、工业、贸易和金融、教育中发展的三条路线。之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美帝国主义明确规定了拉美大陆的各反动政府的三项反动任务（与帝国主义的三个需求对应）：加深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重建官僚-地主国家（**State**）；防止革命。然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秘鲁的官僚资本主义进入了总危机的阶段，开始逐渐被人民战争扫清，于是美帝国主义明确要求他们：重振官僚资本主义；重建官僚-地主国家；消灭人民战争。正如党提出的，这些任务无法是不可能政治上和历史上完成的。

为了从历史上看待世界上，特别是被压迫国家所发生的并理解它们，我们必须世界分为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国家（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措施（经济政策）的基础上理解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关系。需要看到，面对着帝国主义的最大危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开始——帝国主义者是怎样开始把占主导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变为“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并开始激烈地私有化的。

如贡萨罗主席教导我们的，需要考虑帝国主义计划新的国际条件下的再调整和重新评估；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各国官僚资本主义经济进程的局提条件和它们的阶级斗争经验与政治观。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始终看到各种各样的提议、计划或措施是为谁服务的。在“进步联盟”的例子中，他们的计划主要服务于美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各计划，并且也是美帝国主义的各计划的组成部分；其次服务于本国剥削阶级。

（二）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计划、被压迫国家间的争端与鼓励中国复辟

为了在亚洲实现其世界计划，美帝国主义推进了它的霸权主义和反革命的世界计划，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增加资本输出。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如日本试图模仿美帝国主义的做法。这说明了帝国主义内部存在关于亚洲半殖民地国家的争端，和巩固它们在当时这些落后国度的地位。美帝国主义也积极关注中国正在进行的事件，通过修正主义寻求获得影响力，同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有力发展（换言

之：为保持社会主义道路而斗争，而不进入资本主义复辟道路）。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修正主义相互勾结，企图绞杀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支持世界革命的伟大根据地。随着 1976 年邓小平反共修正主义政变，中国成为了寻求通过资本输出获得超额利润的海外金融资本公司的巨大潜在战略市场。

外国直接投资形式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输出占据更重要地位

正如列宁所说，商品生产仍然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基础，但这种基础已经腐朽了，因为金融资本寻求的是能够兑现更高利润率的地方，表现为海外投资。随着帝国主义危机的发展，关于经济领土、市场和原材料来源的斗争变得更尖锐，这主要是指争夺半殖民地国家。因此，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资本输出不断增加，外国直接投资变得日益重要。这意味着第三个矛盾（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的激化，尤其是被压迫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这个主要矛盾的激化。

外国直接投资是以“一揽子”协议的形式完成的，我们在论述台湾地区的案例时会看到这一点。这是说，这是“生产性资本”输入到被压迫国家的主要形式（如果从这些国家的角度看外国直接投资）。这使得被压迫国家的生产结构变得更为畸形，因为实际上唯一会增长的是与世界市场需求相关的东西。当这些需求发生变化时，无论是因为经济的还是非经济的原因，留下来的都是成千上万的失业者、鬼城、废弃的矿井和各种各样的垃圾——后果是既要承担高昂的社会和经济

成本，还要付出高昂的国家资源代价，更“需要”帝国主义资本以同样的方式开始和结束。这就是帝国主义统治的恶性循环，维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本封建地位，官僚资本主义在其中发展。

通过“一揽子”的外国直接投资，帝国主义垄断同盟增加了帝国主义资本的商品进出口来作为生产最终产品的投入。这些“投入”代表了“最终产品”在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国成型需要的全部零件——这里说的“生产”在多数例子里只是组装或经常只是包装。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国际生产分割”、“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等等。

让我们通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 2009 年 11 月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后来以《亚洲的崛起，全球视野中的贸易与投资》出版，由 Premachandra Athukorala 编辑，2010 年选编，第 31 页前）和来研究东南亚经济发展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以及帝国主义投资在世界的这一地区是如何发展的：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生产分割一直是世界贸易的主要特征之一。总部位于美国的电子科技跨国公司开始了这一进程，以应对国内实际工资增长和来自低成本生产者的进口竞争日益加剧带来的压力。美国政府引入国外加工关税（OPT）的规定促进了这一过程。这个规定允许企业在获得许可后出口原材料，在海外完成加工，然后进口最终产品，而只需依据缴纳海外加工环节的总增加值税（不含为此出口的各种中间产品的价值）。地理、成本和历史因素等因素组合起来促使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拉丁美洲各国探索外包机会。然而，这些国家不利的投资环境——宏观经济不稳定、政治紧张、工会动荡

和不确定性——导致美国生产商转向位于东亚的次级供应商。”(Helleiner 1973,Grunwald and Flamm 1985,Feenstra 1998,Brown and Linden 2005.)

这与之前看到的《埃斯特角宪章》有关，同样也与垄断组织之间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海外经济领土”的统治权以获取“帝国主义超额利润”有关，如下所示：

“全球电子产品生产网络开始青睐东南亚地区是在 1968 年，当时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和德州仪器（TI）两家美国公司来到这里建立半导体设备组装厂。到上世纪 70 年代初，新加坡在美国和欧洲半导体行业的海外组装活动中占据了最大份额。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几乎每一家国际电子产品生产商都进驻了新加坡，当硬盘组装商进入新加坡，进一步提升了新加坡作为全球组装中心的地位（见本卷第 4 章）。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半导体生产的相对重要性下降，计算机外部设备，特别是硬盘驱动器和电脑，成为海外电子工业中更为重要的部分。到 20 世纪 80 年代，新加坡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硬盘出口国，几乎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McKendrick 等，2000 年。)

美国电子工业垄断组织是第一批将流水线组装工作外包给新加坡的，但最终，这一行业的所有国际垄断组织都进入新加坡参与分饼。后来，这些垄断组织扩张到其他国家，如下所示：

“从 1972 年起，在新加坡拥有生产设施的跨国公司开始将一些低端组装活动转移到邻国（尤其是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以应对工资和地价的飞速增长。许多刚到当地的跨国公司也绕过新加坡，在这

些国家建立了生产基地。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这一进程催生了新的地区性劳动分工，分工的依据包括：生产进程各阶段的技能差异、相对工资、改善的通信和交通基础设施。当时，新加坡政界普遍对此有所疑虑.....然而.....电子工业.....在东南亚的生产活动需要大量的、不同的零部件供应，也需要更大的经济规模和为各参与国提供更加专业化的可能。最近，区域生产网络开始扩展到越南（...2007 年）。尽管在地理位置和相对工资方面有明显优势，但印度尼西亚迄今未能从这种新的国际分工中获益，原因是当地不利的国内投资环境（...2006）。 ”

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资本流向被压迫国家，目的是为其投资和商品抢夺市场，支配原材料来源和剥削廉价劳动力——即在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斗争中领先于竞争对手。在世界的这个地区（东南亚），研究表明：

“若干因素构成了该区域作为组装活动场所的持续吸引力。首先，尽管增长迅速，但除新加坡外，所有东盟国家的制造业工资仍然低于或可与欧洲周边国家和墨西哥相比.....其次，相对成本优势因素和相对有利的贸易环境互补，投资政策协议和更好的港口和通信系统，通过降低“服务链”的维护成本来促进贸易（这意味着一切都受到外国直接投资的支配，作者说明）.....从事装配活动的跨国公司的选址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某一国家或邻国市场上其他关键参与公司的存在的影响。在该地区长期成功运作的背景下，许多跨国公司（尤其是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大大增进了其东盟区域生产网络的技术活动，并将全球生产责任分配给了位于新加坡的子公司，最近又分配给

了建在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子公司。(Borras 等，2000 年；McKendrick 等，2000 年。)

“总之，东盟地区的经验似乎支持这样的看法：跨国公司的子企业通常会吸引更多的子公司进入所在国；子公司经营的时间越久，全球投资环境就越有利于该国（Ragan 和 Lawrence，1999 年；Athukorala 和 Yamashita，2006 年）。这些年来，新加坡在地区生产网络的角色在逐渐转变——从低技术产品的组装地和零件生产和设计方面的测试者和供应者，变为邻国各生产服务单元的总部所在地。新加坡作为跨生产网络的地区性中心的吸引力一直在增强，促成这一点的因素包括：政府政策着重发展基础设施，扩大人力资源基础，保持亲善国际生产活动的劳动力关系，以及宏观经济管理。”（McKendrick 等，2000 年；Brown 和 Linden，2005 年。）

上文引述表明，国家（State）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应向帝国主义金融资本提供一切。它证明了这些国家（countries）的半殖民地性质：国家（State）必须为外国投资和本国大资产阶级和地主提供一切基础设施；国家必须提供保健、教育、社会服务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以最低的价格再生产劳动力，以及合同保障和所有其他类型的保障；政府必须确保低工资、长工时和恶劣的工作条件，并注意增加国家（country）的国际储备，以保证外国资本的投资和回报利润等。这一切都与生产、贸易、金融和劳动力的“自由化”有关。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国家（State）规模的缩小，相反，它意味着国家（State）主

权对一些国家（countries）（帝国主义国家）有所扩大，而另一些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则有所减少。

继续，研究表明：“这些数据.....有助于了解为什么零部件贸易对世界机械和运输设备贸易日益重要，以及东南亚国家在这一贸易中发挥的中心作用。世界零部件贸易从 1992/93 年度占制造业出口总额的 20.9%增加到 2004/05 年度的 24.2%（零部件贸易几乎占这两个年度之间世界制造业出口总额增长的三分之一）。在东亚发展中国家，表中所列国家的世界市场份额均有所增长，其中东南亚六国的增长速度高于地区平均水平。在东亚，东盟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突显出了对出口活力和生产分割的高度依赖。在 2004/05 年度，零部件贸易占东南亚国家出口总额的 58.4%，高于 1992/03 年度的 46.7%。”

综上所述，在这些东南亚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基础上，帝国主义商品和资本的输出的必要性，以及对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的需要，助长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

东南亚国家从殖民地转变为半殖民地：未完成的革命

我们必须记住，通过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东南亚经济体发现自己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正如汉斯-迪特·埃弗斯在一份报告中说的（我们选择该报告当作对比来作为旁证）。[8]也就是说，它们变成了殖民地国家，开始了向资本主义（半封建主义）缓慢演变的过程。

在同一份报告中，我们读到：“在 1920 年，进出口占荷属东印度群岛殖民地生产总值的 50%以上，同时马来西亚的情况也可以举出类似的数字.....从自给自足的生产转变为市场导向的生产，农业信贷的扩大和国际贸易的增长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成为东南亚的特征（埃弗斯，1978 年）。问题是：哪里从提高的生产力和增加的农业收入中获益？很大一部分当然是转移到殖民地母国，为西方国家的工业化作出贡献，一部分利润通过外国投资回流到东南亚；但也有一部分被当地的战略性群体（形成中的大资产阶级，作者注解）侵吞了，这个群体在不断扩大和寻求更大的殖民地剩余产品分成。”[9]

简言之，我们引用这份“工作文件”是因为，尽管这些学者具有阶级局限性，但它证明了，随着殖民地经济的建立，“新的群体在新的收入来源的基础上出现了”[10]，“寻求建立一个更符合他们利益的上层建筑。”这些所谓的“战略性群体”正是东南亚本土大资产阶级的派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争取独立，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将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官僚资本主义在其上发展——该报告的作者称这个过程为东南亚“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发展。

该报告继续说：“但是，东南亚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自给农业向出口导向型生产的转变，以及外国投资者取得的主导地位，更不用说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干预，已经改变了东南亚哪怕其最偏远村庄的生活，即使前殖民时期的社会文化结构仍然存在。”[11]

这很重要！该报告尽管具有阶级局限性，但仍证明了一个客观事实，即帝国主义推动封建主义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种与其利益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当这些国家取得形式政治独立后，它们仍然与帝国主义经济联系在一起，它们仍处于世界经济的框架内——正如马利亚特吉关于秘鲁的情况提出的：“一个殖民经济体”。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们变成了半殖民地国家（countries）。在这些国家中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或中等资产阶级足够强大或健壮来扮演“国民经济生活的老大”（马利亚特吉）。

结果，在这些新独立的国家里，掌握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大资产阶级和地主。因此，他们是拥有政治独立或形式主权的国家（countries）。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旧式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不可能了。因此，普鲁士的道路不能再像它曾经在德国那样带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了。只要无产阶级和其政党，在与农民的牢固联盟基础上进行人民战争，不完成一种新式的民主革命，我们国家（countries）就会无限期地维持自己的性质，帝国主义就会继续在其内部“在相当程度上拥有殖民地垄断权”。

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它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大资产阶级的一派战胜了另一派。文件说：“1965年的政变，以及整个国家大屠杀的结果，导致了一个军事政权的建立和外国经济利益的复苏……在1975年，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收入来自典型的殖民地原材料生产。包括石油收入

在内的进出口税占国民预算的 76.7%，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只占预算的 3%。”[12]

这个问题的经济本质是什么？

由此，这个问题的经济本质不是因帝国主义失去了殖民地和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等而“采取新的统治方式”；而是从这些国家在获得形式主权之前开始，经济基础就保持不变，几乎没有变化。由此，因政治和军事上独立的事实，它们变为了半殖民地国家，同时保持着半封建主义。因此，这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官僚资本主义，而帝国主义则在这些国家里“在相当程度上拥有殖民地垄断权”。与这种经济基础对应的是帝国主义通过这些国家的政府采取的某种经济政策（新的或旧的），两派（官僚派和买办派）的代表轮流维护帝国主义的统治，使之深化和发展。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决定了它的政策，而不是相反。

归根结底，那些谈到我们国家的新殖民主义性质的人所建议的是，只要简单地改变政府，我们国家的状况就可以改变；这无非是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的机会主义概念，与考茨基的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首选政策”的机会主义论断有关，这一论断并不是从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出发——即它是寄生的、腐朽的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本质决定了它在经济上的反动性和暴力性，因而在政治上也必然具有反动性和暴力性；（帝国主义）经济统治是首要的，它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政治统治。“新殖民地”的概念不是从帝国主义对

我们国家（countries）的统治的经济本质出发的，它可以是殖民地的，也可以是半殖民地的，这个概念是要试图充当“帝国主义实行的统治形式”，好像帝国主义最多是一个经济政策问题。这是要暗示说，只要政府简单地换届，民族问题就能被解决。

南朝鲜和台湾地区的典型案例

本节我们通过日本在南朝鲜和台湾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来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作用。

南朝鲜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的角色

朝鲜从 1910 年到 1945 年（即日本战败前）是日本的殖民地。1952 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半岛战败后，朝鲜被分为朝鲜和南朝鲜。关系南朝鲜和日本关系的全面正常化则发生在 1965 年。

为了说明日本在南朝鲜的角色，我们引用一位德国学者的话：

“一方面，日本和美国是（南朝鲜）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自 30 年前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外国投资大部分来自日本，日本以许可证和生产资料的形式转让了更多的技术。另一方面，日本的发展援助在南朝鲜总体经济发展计划的实施，特别是在钢铁工业等重要工业部门的建设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在过去三十年里，日本商人在南朝鲜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朝鲜（与台湾地区一道）成为了一些工业部门的供应商；日本的这些生产活动，主要由于成本，

也部分地由于始终在增加的环境需求或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而不再盈利了.....

“.....要想了解日本在南朝鲜经济中的作用，就必须参观南朝鲜工厂，搞明白用于生产的机器来自哪里，将会融入南朝鲜产品中的零部件和原材料来自哪里。了解了这些，才能看到日本在维持南朝鲜经济方面的核心意义。日本在南朝鲜经济中发挥特殊作用的一个关键原因，来自南朝鲜工业的迅速发展。南朝鲜的工业结构最初是纯组装的，然后才发展成一个充满中小企业（SMEs）的工业国。南朝鲜中小企业的弱点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该国对进口技术依赖程度为什么在提高。在当前工业化阶段最重要的行业，如电子和汽车制造业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13]

考虑到德国学术界的精神压力，帕特里克·可奈尔关于中小企业的言论并不令人惊奇，他们将德国的中小企业从德国垄断体系中剥离，而在事实上，这些中小企业根据“参与制”（列宁）组织起来，依附于德国银行。这种控股制度一直延伸到州级银行或储蓄银行（Sparkassen），而这些中小规模银行的分散，使得权力向规模较大的德国银行集中。

另一方面，汽车零部件分支的一位德国企业家抱怨说：中小型企业，作为大工业的供应商，根据委托他们生产零件的大公司的规则和专利开发生产技术——它们必须不断地向这些公司报告利润率。这在德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在官僚资本主义发达的被压迫国家也是如此，帝国主义金融资本所产生的垄断占主导地位。

在大垄断企业与国家干预的基础上的发展

引述的研究涉及南朝鲜官僚资本主义 30 年的整个发展历程，它以大企业和国家（state）干预为基础，由该国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官僚派主导。研究关注的重点是 1987-1993 年这段时间。在这期间，由买办派占主导，推动了所谓的“自由化”。

在这段时期以前，南朝鲜的长期外国投资主要是贷款、援助和“技术转让”的形式，而不是外国直接投资。从 1995 年到 2005 年，流入南朝鲜的外国直接投资平均（每年）为 50-60 亿美元；2006 年和 2007 年保持在 50 亿美元；2008 年为 84 亿美元；2010 年为 69 亿美元——截至 2011 年，这一数字估计达到 1000-1300 亿美元。其中近 430 亿来自美帝国主义，约 240 亿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紧随其后的是荷兰帝国主义者的接近 210 亿美元；名单最后是德国和法国帝国主义者。需要注意的是，帝国主义投资在南朝鲜的一部分是通过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的子公司完成的。

但这并不是全部。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国）对南朝鲜的统治也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金融体制来实现的，例如，在亚洲危机之后，南朝鲜被强制提高了外汇储备增加了准备金，以便不仅能保证公共债务，而且还能保证私人债务——主要是帝国主义银行给南朝鲜商业银行的债务。

二十世纪 70 年代中期和 80 年代，南朝鲜是上演着争取工资、更短的工作日和更好的工作条件的宏大工人斗争的舞台。这些斗争的特征是工人阶级表现出巨大战斗力；结果是工人争取到权利和增加了工

资。在某种程度上，这导致了（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部分“血汗工厂”或装配厂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等工资较低、工作条件更差、工作时间更长的国家。在这些年里，日本帝国主义在其本土也通过增加固定资本投资和主要是降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再加上越来越多地使用廉价和易受剥削的移民劳工，无产阶级整体工作条件的恶化使许多日本公司回到日本也能有利可图。

正是因为部分日企回流日本，一些南朝鲜公司才提高了“本土化”的速度。所以不能说日本垄断组织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因为，正如我们在台湾地区的情况中会更清楚地看到的，这实际上意味着，为了进一步集中，这些垄断组织的“分散”的提高，为的是进一步的集中。“参与制”就是这样形成的。

作为帝国主义在该地区资本再输出基地的南朝鲜

南朝鲜经济独立的神话还要考虑这样的事实：来自日本和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一部分从南朝鲜流向了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以及南朝鲜大资产阶级开始在这些地区进行投资。这说明，在当代的控股制度下，南朝鲜被用作帝国主义国家和劳动力更廉价的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资本输出平台”。要更充分地了解南朝鲜在世界帝国主义经济中的地位，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情况：尽管南朝鲜的资本流出大于流入，但南朝鲜仍然是资本净进口国。其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被压迫国家的金融账户一直处于赤字状态，要记住，每流入一美元，就有三或四美元以利润汇回、支付许可证、利息等形式流回外国资本。

因此，南朝鲜资本外流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外国直接投资的许可证和专利权的利润汇回；二是南朝鲜大资产阶级的资本净流出，这些资本将被投资到比南朝鲜工资更低、潜在利润率更大的其他国家。但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海外投资是按照某个帝国主义垄断组织的母公司做的决定来执行的。这里，南朝鲜大资产阶级是中间人。这样一来，南朝鲜大资产阶级就成了它主人在中国市场的前锋或排头兵。因此，南朝鲜已成为中国的大投资国之一。当我们再转头看一下台湾地区，对这一点也会有更好的理解。

南朝鲜的“开放”进程由大资产阶级的买办派领导

由美帝国主义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强制进行的所谓的“经济自由化的进程”促成了经济发展。这个“进程”在南朝鲜开始的时间约为 1992-93 年，在 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更加“开放”。其他和当前经济形势有关的发现，参见一份 2011 年的报告。这份报告是为在 2011 年 11 月 7-8 日在印度钦奈的三叉戟旅店举办的第十次印度-南朝鲜对话准备的。报告的作者是安忠勇（Choong-Yong Ahn）和洪凯达（Kytack Hong）。这两位研究者对南朝鲜当前形式的描述如下：

“发展潜力指数在下降，尖锐的收入两极分化和日益增长的打仗需求.....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很低，是 3%，但是‘更大范围的失业统计报告的失业率是 11.8%；如果将孤注一掷准备入职考试的人、每周工作 4-5 小时的不稳定就业的雇员统计在内，则失业率会更高。青年失业

现象在加剧.....随着经济结构从传统工业转变为高附加值服务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严重的两极分化（指收入上最高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的分化，作者注解）的原因，可以在出口和内需之间弱化的联系上找到。.....由于以裁减劳动力为特征的公司结构调整和因经济危机和弱化的经济带来的风险，增长对内需的影响几乎没有。前一个主张的依据是金融危机以来出口和内需的关联性减弱。最近，出口很少对创造就业机会和增加附加值做贡献，因为出口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产品上，而这些产品是由进口的零部件制造的。’.....虽然南朝鲜的大集团（包含 300 名以上的工人）只占企业总数的 1%和雇佣了总就业人数的 23%，他们在总的生产和附加值上的份额很高，分别是 52.4%和 49%。在出口表现上，大企业的相对表现非常显著，在 2009 年贡献了总出口量的 68%。.....南朝鲜经济中严重依赖出口的部分约占其总额一半，南朝鲜资本市场的开放性使其面对外部因素时非常脆弱。”（第 71 页起）

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对南朝鲜的更大统治

报告进一步做了解释，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对南朝鲜经济的统治：

“随着欧洲主权债务问题的加剧，外国投资者减少了对南朝鲜股市的参与。各大银行不得不为海外借款支付更高的成本。2011 年 10 月 6 日，南朝鲜 5 年期外币债券的信用违约掉期(CDS)溢价达到 201.5 个基点，较 7 月末的 103.0 个基点飙升近 100 个基点。韩元对美元的

贬值率在 20 种主要货币中排名第三。此外，有迹象表明，国内外的金融不确定性正在蔓延到实体经济，减缓经济增长.....然而，南朝鲜由于其高度的对外依存度，很可能出现金融市场波动。南朝鲜对外贸易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世界最高水平，2010 年为 87.9%。根据（南朝鲜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指数，作者注解）的市值，外资投资国内股票的比例也很高，截至 2011 年 10 月 11 日为 32.8%。2011 年 8 月至 9 月，南朝鲜股市净流出外资 7.2 万亿韩元，债券市场外资净流入 0.1 万亿韩元。在股市和债券市场，欧洲资本净流出分别为 4.4 万亿韩元和 3.2 万亿韩元。.....近期内，南朝鲜应努力确保足够的外汇流动性，以平息对另一场流动性危机和主权债务评级可能下调的担忧（即保持高外汇储备，作者注解）。”（第 92 页）

看一下南朝鲜政府在 2008 年世界危机后采取的措施所揭示的东西：

“南朝鲜政府采取的措施侧重于减少银行海外借款造成的脆弱性.....。2010 年 6 月，政府出台了银行远期市场外汇衍生品头寸上限作为对他们资本的比例。其目的是减少银行向出口公司提供远期合同而产生的短期外债，防止资本突然大规模撤出的可能性，特别是外国银行分行。”（第 98 页）

关于汽车生产或装配工业的发展，有必要澄清两件事，因为这种生产活动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外国直接投资是如何通过“参与制”的方法，来扩大和夺得市场和在被压迫国家生成垄断组织来模仿和谄媚帝国主义国家。

因此，这一“南朝鲜的”工业是基于大垄断企业的各种车型生产的，并正在借助来自三菱、通用、福特、马自达等公司的流程和技术来取得发展。——这是说，借用帝国主义汽车垄断公司的许可证和专利，从下面郑明基（Myeong-Kee Chung）制作的调查表[14]中可以看出：

表 H-4“南朝鲜汽车工业的生产和技术策略的市场发展阶段(1964 年到 1995 年)”

； 1964-1974； 1974-1981； 1982-1987； 1988-1995

市场：开创期；销售增加；扩大国内市场,国内公司竞争；扩大市场,较大的依赖外国市场,不断要求提高质量

生产方法：产量较少,型号较少(KD 生产)；产量较多,型号较少(开发自有型号)；产量较多,型号较少(外国公司许可生产)；产量较多,型号较多

技术战略：着重提高机械化程度；着重提高生产技术；着重推广泰罗-福特制；增加各生产阶段的同步性;灵活的标准

加工技术来源：福特,丰田；三菱,通用汽车,从外国公司获得许可；三菱,通用汽车,福特,马自达,从外国公司获得许可；三菱,通用汽车,福特,马自达,从外国公司获得许可,自行研究开发

注意最后一行：“加工技术的来源”。我们在上一段中已经强调过，这部分内容揭示了“南朝鲜”汽车工业的真正本质。

另一张图表显示了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金字塔结构（“小型”和“中型”或“二级”公司），这些供应商被汽车装配商（所谓的最终“汽车生产商”）支配着：

表 B-1：南朝鲜的供应链管理（1990 年）

二级供应商（约 4000）——直接供应商（1548）——最终制造商
(3)

来源：郑 1994a

在南朝鲜汽车工业供应商体系的顶端，有三家官僚资本公司从 1548 家直接供应商那里获得汽车零部件（在帝国主义汽车垄断组织的许可证约束下）。而这些直接供应商则由 4000 家次级供应商供货。这意味着，因“参与制”而本质上依附于大的帝国主义垄断组织的三家装配公司，支配着 5548 家“中/小公司”。

综上所述：所谓“南朝鲜工业化”，无非是南朝鲜社会里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驱动这个发展的主要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它们之间同时也在勾结和斗争。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承认，这个结果是南朝鲜经济依附于世界市场。换言之，它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利益和需要——根据列宁的认识，这种依附无非是帝国主义经济对南朝鲜经济的“压迫和暴力”关系。随之而来的是这个国度资本主义的官僚主义作风。

台湾地区的例子：外国直接投资与所谓的“技术转移”

帝国主义的宣传者和各国机会主义者讲的众多童话中有一个是说：今天落后国家的“依赖”减少了，因为今天“我们需要的外国资本”是以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出现的，“这种投资对技术转让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也“对自主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这些外国资本现在不再主要以“陷阱”贷款或公共债务的形式出现了。但是他们忘记了“发展援助”（特别是日本的“援助”）是帝国主义干涉我们国家经济政策的另一种方式，其目的是为了他们的资本和货物的出口，扩大他们在受援国的、对这些外国资本有利的社会基础。此外，他们还补充：由于这些外国直接投资现在大多来自像我们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因此应该具有些不同的性质。这些错误的结论说明，我们有必要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一些根本性问题。

因此，有必要配合我们的评论来介绍一些 JM·格肯的《关于在华台日合资企业的案例分析》中的摘录[15]。这些摘录清楚地表明了这种“一揽子”外国直接投资的阶级特征。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局限性是什么呢？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案例分析；它将日本在台湾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方面的内容联系了起来，这些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是：“外国直接投资一揽子转移”或“简单标准化产品生产转移”，将会“在一连串的投资周期里的下一个周期里明确（指追赶型生产周期或雁行形态发展论，即后进国家的工业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完全进口、进口替代、出口化）”，即，在日本-台湾地区对中国的投资的周期里。

我们将用这个案例的经验来说明帝国主义（在这个案例里是日本的）金融资本是怎样参与生成台湾地区官僚资本主义的中间的（附属的或下级的）公司的；以及显示日本帝国主义资本是怎样来通过这些投资渗透中国。我们将用这些切实的案例来显示这些具有依附性质的金融资本国际网络是怎样生成的，以及最初在（帝国主义的）各国形成后，这些垄断组织和相应的网络又是怎样扩展到第三世界国家和中国（作为经济上最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和投资获利更多的地方）来获取超额利润的。

这个作者（格肯）的问题或局限在于，他是怎样看待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周期”的：他在这个周期里看到的仅仅是第一阶段，而没有看到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完整周期；他将这个周期的第二阶段看作是接受国的新投资，或最多是成为新旧投资的混合体——日本对南朝鲜的直接投资（主要日本公司或母公司的附属公司或子公司），然后是在如越南或菲律宾等其他国家的投资（子公司的子公司）。我们必须运用列宁提出的“**参与制**”的概念，才能确认这些投资的真实性质。

跟随着他的导师小岛（Kojima）的脚步——虽然这些“脚步”和他本人揭示的事实南辕北辙——格肯将帝国主义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第二阶段看作是直接投资，即，东盟的“新兴工业经济体”投资中国大陆和越南。他将这些投资称为“新的直接投资”和“生产循环的扩展”，也将这些东盟的“新工业经济体”称作“雁行经济体”。也就是说，他的研究的对象是一揽子外国直接投资中部分资本的转移过程，即，简单和

标准化的日本所需产品的生产从台湾地区（在当地称为“新的标准化生产”）扩展到或转移到中国大陆的过程。

显然，这份研究关注的是物品（拜物教）的关系而不是这些物品反映的关系；这是说，这份研究没有关注生产的社会关系。这是我们现在必须强调的随后引文中的主要内容。为什么？因为如列宁在前述作品中指出的，除了他们的资产阶级观点，**这些学者将附属公司看作是独立的，仅仅因为这些公司在法律上是独立的；也因为这些学者在试图粉饰帝国主义。但是，如列宁告诉我们的，我们处理的是“这样一些著作，这些著作虽然抱着资产阶级的观点，但毕竟还是对金融寡头作了近乎真实的描述和批评，当然是市侩式的批评”。（同前引列宁的著作）**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些引文：

“因为小岛发展出来的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后面的讨论中可以用于建立起与微观经济方面的联系，所以可以认为这个理论为这方面的讨论提供了可用的框架。小岛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在接受国的造成的影响，并注意到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与美国和欧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有一些不同。为了澄清这个不同，小岛定义了一种外国直接投资，用于描述雁行经济体更乐于接受的、并持续蔓延到东亚其他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在这个关系里，我们可以看到‘直接投资周期’。这个周期，最初开始于一个工业国，并传递到一个新兴国家，然后再传递到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可以看到新兴工业经济体，例如南朝鲜、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开始对东

盟各国做直接投资。这些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还主要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接受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新兴工业经济体开始投资中国大陆和越南。随着新的直接投资周期的开始，新兴工业经济体的企业开始显示出已经获得的技术、资本和商业管理方面的知识，而生产周期也在这个水平上有了扩展。从经验上来说，我们会查看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扮演了什么角色，来发展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活动；以及，日本在台子公司将哪些具体的生产、流程和商业管理的知识应用到它们在中国其他地方的投资里。在这个例子里，台湾地区合作伙伴的知识进步可以在微观水平上观察到。其中一部分台湾地区投资者在中国大陆的生产活动里应用的生产和技术流程，是他们依据当地条件发展出来或经过调整的。在这个案例上可以看到一种说法：‘混合的技术转移’，在一些特定场合里更适合中国大陆的条件。”（同上引用自序言）

这样，对生产“周期”的描述是以“后续投资的现象”（宏观经济层面）来完成的，并集中在微观经济（商业活动）方面，这是说，“子公司的贡献”恰恰体现在“指定商品的再生产”上。这就是他们处理“直接投资手段”[28]的方式。“商业设备的内容代表了一揽子外国直接投资，包括：生产知识、流程知识和商业管理知识。资本可以部分或全部地替换为特定的、过时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工业财产，例如二手生产设备。”

继续引用这份研究：“和日本的经历类似，台湾地区在劳动密集型工业上的比较优势在减少（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在落后经济体中

很常见，作者注解）。因此，台湾地区自己开始把它的劳动密集型工业转移到低工资各国（可以看到，依据发展程度建立起了一整条雁行结构，表现为在某个母垄断组织的“参与制”控制下的、按劳动力的使用程度部分划分的各国的各公司，作者注解）。随着工业化推进，台湾地区积累的国际出口经验有利于其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台湾地区的附属公司因为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而被加强了。台湾地区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从 1983 年到 1996 年增加了大约 300 亿美元。

“对比电力和电子工业领域日本在台湾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台湾地区在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可以看到日本的介入程度很强。从 1952 年到 1997 年，日本投资资本的 27% 流入这方面。有 375 个中、小型企业和 33 个大型日本企业在台湾地区建立了一个或多个子公司。这些日本公司的生产范围包括了从电缆到计算机的所有产品。这些产品包含了很多标准化的零部件和简单附属物。台湾地区在显示器、键盘和其他周边设备上的投资值得关注。这些旧型号的生产几乎都转移到了中国大陆，例如：15 英寸显示器。日本的存在感在台湾地区汽车工业里更显著。八分之七的自行组装产品的生产商与日资合营和与日资有合作合同。同样的型号，在台湾地区和在日本的组装流程相同。这也反映了两国汽车制造业的密切的合并现象。这里也有一些案例：简单的零件、车体和车内电子产品的生产作为后续投资的一部分转移到中国大陆。

“在东南亚，来自新兴工业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绝大多数是中小规模的企业。这些企业当时已经将它们的简单商品生产活动扩大或

全部转移到海外。这样的里程碑之一是：欧盟和北美自贸区与东盟各国正在讨论的、优惠的贸易条件。另一个新兴工业经济体的直接投资的里程碑是：东南亚的本地市场（有规模的经济体，作者注解），这些市场在之前是从新兴工业经济体进口商品的。最近一波新兴工业经济体投资者的大潮里包括了移动型的出口商，它们会向低工资地区转移生产活动。在东南亚，简单的电子零件和电子设备，光学零件（例如：镜片）和家具零件在被组装。

“选择低劳动力成本和市场取向的理由，也可以在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投资的三个主要策略里看到。成熟的产品以劳动密集型的方法生产，这主要涉及‘3C’：电子消费品、计算机和通信产品。这个划分可以看作国际劳动分工中对复杂的高技术产品技术流程和标准化的主要和中间产品的一个划分。在这些标准化的产品（主要的或中间的）生产领域里，参与的主要是新兴工业经济体里的小规模的和灵活的公司以合资的合作伙伴或 OEM 生产商（原始设备生产商）。这种国际劳动分工的典型模式可以在个人计算机工业里看到。最上面的是美国公司，负责为个人计算机开发软件系统和制作中央处理器（CPUs）。日本公司提供关键零部件（例如：液晶显示器/LCD）。”

这个分析很重要，因为它显示了引进这些软件来生产产品的南朝鲜垄断公司三星的中介属性。很显然，主要是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控制着这个领域，日本帝国主义资本紧随其后，再然后才是其他帝国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或中国帝国主义的公司的中介角色或功能，可以从它们从属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方式上看起来，如下：

“一些计算机零件在南朝鲜和新加坡有专门的供应商。台湾地区制造商的目标是提供更高质量的外围设备和独立组件。简单设备的供应，如键盘、中间产品、零件等，则由中国及东盟国家的公司承担.....劳动密集型产品及简单前置产品的外包不断改进，也影响到了上面这些台湾地区特产的零部件。例如，就液晶显示器的生产而言，最低生产水平的液晶屏幕由中国的一家台湾地区公司生产。产品的快速升级和推广（如 17 寸显示器）也将标准化生产方法带到了较低水平产品（如 14 寸及 15 寸显示器）的生产上，使得这些‘过时产品’仍能保持盈利。”（同上）

因此，帝国主义资本的输出资本意味着它的经济危机也输出到海外国家，这就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球的国际金融资本的依赖和关系网络，正如列宁警告我们的：

“应当作为主要之点提出的是前面已经简略谈到的‘参与制’。德国经济学家海曼大概最先注意到了问题的实质，请看他是怎样叙述的：‘领导人控制着总公司（直译是“母亲公司”），总公司统治着依赖于它的公司（“女儿公司”）；后者又统治着‘孙女公司’等等。于是，拥有不太多的资本，就可以统治巨大的生产部门。事实上，拥有百分之五十的资本，往往就能控制整个股份公司，所以，一个领导人只要拥有一百万资本，就能控制各“孙女公司”的八百万资本。如果这样“交织”下去，那末拥有一百万资本就能控制一千六百万、三千二百万以

至更多的资本。’.....‘最简单、因而也是最常用的一种把资产负债表弄得令人看不懂的办法，是成立“女儿公司”来把一个统一的企业分成几部分——或反过来合并它们。从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目的看来，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所以现在不采用这种办法的大公司简直是一种例外。”“虽然资产阶级的诡辩家和机会主义的‘也是社会民主党人’期望（或者要别人相信他们期望）股票占有权的‘民主化’会造成‘资本的民主化’，会加强小生产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可是实际上它不过是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而已。.....但是，‘参与制’不仅使垄断者的势力大大地增强，而且还使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可以盘剥公众，因为‘母亲公司’的领导人在形式上，在法律上是不替‘女儿公司’负责的，‘女儿公司’算是‘独立的’，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女儿公司’“做出’种种事情。.....垄断既然已经形成，而且操纵着几十亿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它任何‘细节’如何。”

“金融资本对其它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表明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有统治地位，表明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比其余一切国家都突出。.....世界上其它各国，差不多都是这样或那样地成为这四个国家、这四个国际银行家、这四个世界金融资本的‘台柱’的债务人和进贡者了。现在，我们应当特别谈一下，资本输出在形成金融资本的依赖和联系的国际网方面所起的作用。”[16]

对过去三十多年帝国主义（及其结果官僚资本主义）在东南亚的发展事实的阐述，显示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理论的充分有效性。

我们看到的是资本输出的增加，其结果是斗争的加强，其中，大型垄断组织和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更彻底和更广泛地渗透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而进行竞争。这就使半殖民地国家的生产越来越依赖这些资本，越来越畸形，因为它们的生产是为了满足帝国主义世界市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国内的发展。这样，我们看到了“金融资本的依赖和联系的国际网”的发展，换言之，是最大的帝国主义垄断组织或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生产网”，“国际生产网”，或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希望的称呼。

这些网络不过是最大垄断组织通过和平或暴力手段争夺世界经济领土的触手，这项案例研究的作者将其视为外国直接投资和“产品”周期，其他人则称之为“全球价值生产链”。对我们各国来说，这意味着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的进一步深化，而官僚资本主义以此为基础发展了。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说：

“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

“资本主义是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商品生产，这时候，劳动力也成了商品。国内交换尤其是国际交换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工业部门和各个国家的

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跳跃式的。.....在先进的国家里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

“假如资本主义能发展现在到处都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农业，假如资本主义能提高在今天技术惊人进步的情况下仍然到处是半饥半饱、乞丐一般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那当然就不会有什么过剩资本了。.....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民众半饥半饱的生活水平，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条件和前提。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主要的铁路线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少数国家中已经‘过度成熟了’，‘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

“这样看来，金融资本的密网，可以说是真正布满了世界各国。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是设在殖民地的银行及其分行。.....从假借的意义来说，输出资本的国家已经把世界分割完了。但是，金融资本又引起了直接的分割世界。”

“既然谈到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政策，那就必须指出，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列强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分割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的附属形

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一种形式——半殖民地。而阿根廷又是另一种形式的标本。舒尔采-革弗尼茨在一本论不列颠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写道：‘南美，特别是阿根廷，在财政上这样依赖于伦敦，几乎可以说是成了英国的商业殖民地。’”[17]

技术转让和一揽子外国直接投资

让我们继续引用这项案例研究：

“一揽子外国直接投资的转让包括特定技术的产品、工艺以及管理方式，其具体内容 by 合同加以约束。由此，转让的选项，在每一个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一开始就受到各项协议的限制。关键是合约中本地一方能够取得成功的程度，涉及的因素包括：手头的一揽子外国直接投资的内容，加上本地建立生产的能力。在许多情况下，真正参与转让的知识包括了由投资者自己掌握的知识（自有技术），而这是无法完全化为技术规范、图纸、操作说明等材料的，只能通过合同约定来实现。因此，确定外国投资者实际和真正转让的知识是很重要的。通常，生产质量会被有意识地降低到最低限度，以免损害外国投资者的技术优势，或仅仅是为了防止产品与外国分公司的产品重叠。在某些情况下，接受转让的一方发现尽管所有技术信息都是准确的，但是产品和外国分公司的重叠。在某些情况下，接收方会感觉到虽然所有

的技术信息都是完整的，但仍缺少某些内容。这种缺少的知识存在于投资者的经验中，但是没有前车之鉴来预测技术接受方在何时和何种程度上获得这种知识。例如，图纸包含精确的技术数据和详尽的制造说明，但是遗漏了某些信息，如最佳制造温度，这要几年后才能发现。因此，无法确定投资者无形资产的确切价值。但是，接收方可能更详尽地确认这份知识的具体价值。”

此外，我们要注意到，在每个“投资项目”中转移的是已经在生产的产品或设计。因此，即使它是“最新的”或最近的，它都是过时的，因为母公司已经在研究和开发更新的。这种研究和开发（R&D）是不会随着一揽子而转移，而是留在母公司。此外，制造车间使用的机器是较旧的型号，在许多案例里都是已报废的——它们在账面上的价值为零或只是象征性的。当它们作为“一揽子”外国直接投资的一部分出口时，它们在外国附属公司的账面上作为固定资产获得了新的价值。但是，即使这些机器是“最新一代”，它们也没有对技术接受国技术发展做过贡献，因为它们是在外国生产的；同样，这也不意味着转让国的机器生产部门发生了改变，在为接受国的工业生产机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外部投资是根据垄断组织在争夺世界市场的斗争中的利益发展而执行的。在被压迫国家或如中国这样的最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产生的企业，都被帝国主义企业的触手束缚着。这种束缚在任何情况下，以各种方式确保了这些企业服从于创造它们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

台湾地区：另一条“亚洲四小龙”

“亚洲四小龙”中的另一条是台湾地区。它被帝国主义支配，主要是被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勾结又斗争的美帝国主义支配。对台湾地区的研究说明了近几十年来帝国主义推进更强支配的过程是怎样的，就像它在其他被压迫国家的作为一样，它们试图用“全球化”、“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和“融入全球生产链条”等术语来掩盖对被压迫国家的支配。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最好考虑一些具体的数据，例如包含在在**上述 1952 年-1997 年期间的研究的数据**。我们在把它作为一个注释。[18]

在这段注释之后，这篇文章说：“另一方面，台湾地区也是积极的海外投资者，目的是扩大产销网络，打入新市场。在这方面，**2012 年金融保险业占主导地位，对外输出资本数量增加了两倍，超过 45 亿美元**。第二位，正如预期的那样，是电子工业部门，规模为 **13.5 亿美元**；冶金设备以 **6.434 亿美元**位居第三。在台湾地区对外投资的 **81 亿美元**中，占比最大的份额流向新加坡：**45 亿美元或 55.6%**的投资流向新加坡这个东南亚城城市国家。投资日本的比例是 **13%**，越南的是 **11.7%**。最后，**0.2%**的台湾地区的投资流向了德国(台湾地区经济部投资委员会，**2013 年**)。在这些方面，上面的列表没有说明台湾地区的公司在大陆投资的案例。在现实里，台湾地区的公司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占据了投资总数的最大份额，尽管在 **2012 年台资委**记录到的对海峡对岸的投资仅为 **109 亿美元**，比上年减少 **17%**。其中，电子产品部门投入 **19.5 亿美元**，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投入 **15.2 亿美元**。

“与此同时，2011 年至 2012 年，中国大陆对台投资增长逾 7 倍，达到 3.28 亿美元。对这类需要授权的投资来说，这个规模上的扩张是决定性的。直到 2012 年 8 月，两岸之间才正式签署协议来保护和促进投资。”[19]

前面引用中的下划线是我们标的。我们用这句强调像台湾地区的官僚资本主义政权这样的垄断组织扮演的中介角色；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点，只要对比下日本对台湾地区投资建立子公司的动机，和台湾地区的子公司对中国大陆投资建立下一级附属公司的动机。同样地，通过比较台湾地区大买办资产阶级在东南亚的投资，与我们之前引文中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和电子产品零件制造业和高技术工业的发展，我们就能理解列宁对参与制的重视，以便将帝国主义理解为由金融资本产生出垄断统治的阶段，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形成鲜明对比。官僚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已经产生，并由数之不尽的联系服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归根结底，他们的存在取决于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

我们已经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帝国主义国家增加外国投资之后，它们对半殖民地国家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对中国等较低发展程度的国家）的出口明显减少（不平等发展规律）。这个现象在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这一地区的投资及其影响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即，因资本输出而形成的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帝国主义国家经济上的落后性。

另一点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香港地区、台湾地区 and 南朝鲜来完成的，它们是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平台。当我们看到帝国主义在这些地方的投资以发展银行和金融业的形式增长时，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同时，中国帝国主义者也在谋求银行业、金融业和服务业的改组和进一步发展。

作为中国大陆的第二大投资者，台湾地区目前正被南朝鲜超越。因此，在考察这个地区的情况时，我们不能忽视台湾地区代表的、服务于宗主的利益的、具有从属性和被征服的角色，这是半殖民地条件下，充当中介的大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所代表的东西。因此，在下面的尾注中我们提到了台湾地区在中国大陆的投资。[20]

为了仔细看清参与制，可以用到这份研究的结论。我们将这些结论作为注释，包括：“**3.日本在台湾地区的附属企业的商业结构**”和**条目 4、6 和案例研究 5**。[21]

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对这一过程的整体认识

让我们自问：我们如何理解这个过程？这种发展的性质是什么？已经确定的是，这整个过程只在帝国主义外国投资支配的被压迫国家存在。

1975 年，贡萨罗主席向自己提出了一个与此类似的民族形势问题，他回答到：

“马克思主义如何看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分析了这个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080 页）：‘为着打败日本侵

略者与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但是，在国民党政府领导之下，一切依赖外国，自己的财政经济政策是破坏一切经济生活的，国民党统治区内仅有的一点小型工业，也不能不处于大部分破产的状态中。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遇着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

“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与统一的中国，不能有工业的中国。消灭日本侵略者，这是谋独立。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实现人民的自由，人民的统一，人民的军队，实现土地改革，解放农民，这是谋自由、民主与统一。没有独立、自由、民主与统一，不可能有真正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人民的福利，没有国家的富强。”

“马利亚特吉关于这个事情的观点.....我们强调：‘帝国主义不允许这些半殖民地的人民拥有民族化和工业化的经济纲领，它们需要将这些人民作为资本和商品的市场以及原材料的产地来剥削；帝国主义逼迫他们采取垄断和单一产业（例如：秘鲁的石油、铜、糖、棉花生产）...’”

“所以，对马利亚特吉来说，帝国主义不允许我们发展真正的民族工业（即为民族服务的工业），更不会允许我们发展自己的独立工业化计划。如果工业的可能性确实受到‘国民经济的结构和性质’的限制，那它更将受到经济生活对国外资本主义利益的依赖的限制，正如他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中所教导我们的那样。

“我们国家的情况是：工业是作为附属产业发展的，且，其结果为，服从帝国主义，主要是北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自第二次世界大

战前以来，这里有多种手段刺激工业进程，同时发展国家（State）对上述进程的直接参与。但是，鉴于统治国家的阶级，是不可能采取除了在帝国主义的庇护下发展工业化进程这一愿景以外的其他任何方式，激励他们发展工业进程的。”

正是如此！这篇文章就像是对上述有关亚洲经济发展的研究的评论一样。

贡萨罗主席在《人民之声》的一篇文章里继续深入讨论了这个问题：

“.....一个人怎样来认识我们国家的官僚资本主义？.....毛泽东出色地——虽然也很简练地——在《论联合政府》中向我们阐述了官僚资本主义的问题；在考虑广大人民群众处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严峻形势时，他说：

“为什么在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领导下会产生这种严重情况呢？因为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个极端少数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们也说“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也说“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中国经济，一面又在实际上扶助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

本，垄断着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一面又在实际上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和其他地方一样，下划线为《人民之声》所加）

“让我们注意其中的关键：首先，毛主席明确了官僚资产阶级是由大地主、大银行家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权贵组成；其次，他指出，官僚资本垄断了经济；第三，他提到了它“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基于这个论述和经济立场，官僚资本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反动的政治属性。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毛主席分析了官僚资本的发展过程：

“‘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个资

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

让我们直接看看贡萨罗同志在前述的《人民之声》的文章中关于这段引文的评论：

“在这篇文章中，毛主席确立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向我们展示了这四大家族的资本是如何堆积成了庞然大物，并最终完全垄断了经济。然后，他指出了垄断官僚资本如何‘与国家权力相结合，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点意义重大：垄断资本通过与国家相互勾结而成为国家垄断资本——并不像一些人简单认为的那样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事是它是垄断资本，这是它与帝国主义之间牢不可破的纽带的本质（记住列宁证明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是它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另一方面，毛主席教导我们，这种在发展过程中与帝国主义、地主和旧式富农“紧密系”的垄断资本主义，正如他所说的，‘已经成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和封建资本主义’。毛泽东认为，这不仅是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基础，而且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最后，在达到‘发展的最高峰时……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尽管我们中间有关于官僚资本主义的讨论，但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官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它使民族民主革命的条件成熟。

“我们必须严肃地学习毛泽东的这段关于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论断，并据此来判断我们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

在这里，贡萨洛主席指出了我们了解官僚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它不仅使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社会，也使我们了解与我们相似的社会形态，这是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条件。

《秘鲁共产党总政治路线》声明：

“贡萨洛主席认为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理解是理解秘鲁社会的关键。在毛主席的理论指引下，他指出了五个特征：（一）官僚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在经济落后国家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是由大地主、大银行家和资本巨头的资本组成的。（二）它剥削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并且压迫中等资产阶级。（三）现在正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官僚资本主义与国家力量结合演变成买办的和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追溯其来源，在其第一个时期，它表现为非国有的大垄断资本主义，在第二个时期，它与国家力量结合，表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四）它已经到了其发展的最高阶段，因而民主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五）没收官僚资本是将民主革命推进到顶点的关键，这对于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通过运用以上论点，他得出了**官僚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在落后国家产生的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衰落和对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的支配相联系**。这个制度不是为大多数人民服务的，而是为帝国主义者、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服务的。.....因此，**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剥削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并且压迫中等资产阶级**。为什么？因为它所发展出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只允许经济为帝国主义的利润服务，因而发育迟缓的进程。这种资本主义代表的是大

资产阶级、地主、旧式富农，这些由少数人组成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大多数人民群众。

“贡萨罗分析了官僚资本主义在秘鲁的发展**进程**：从 1895 年开始到二战前的阶段，第一个历史时刻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买办资产阶级控制了国家，取代了大地主但是仍然维护大地主的利益。第二个历史时刻发生于二战到 1980 年的阶段，上述进程加深了，并且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发展成官僚资产阶级。.....由此产生了一次大资产阶级的两个派系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第三个时刻发生在 1980 年至今的极端，官僚资本主义进入一般性的危机和最终的毁灭.....无法挽救。官僚资本主义最多只能缠绵病榻。另一方面，和被痛苦折磨的野兽一样，官僚资本主义会试图通过打碎革命来保卫自己。

“如果我们从人民的道路来看这个过程，在第一个时期，马里亚特吉在 1928 年创建了秘鲁共产党，国家的历史从此一分为二；在第二个时期，贡萨罗主席将秘鲁共产党重建为一个新型的政党，并清除了修正主义；在第三个时期，秘鲁共产党开始领导人民战争：这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通过质量上的飞跃改变了历史进程，用武装力量 and 人民战争让夺取政权成为了一个现实的目标。所有这一切只不过证明官僚资本主义鲜为人知的**政治方面**，也是贡萨罗主席认为的关键部分：官僚资本主义使得革命的条件成熟了，而且今天它进入了其最后的阶段，使得革命发展和胜利的条件成熟了。这是以前很少被人强调，而被贡萨罗主席视为关键因素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方面的特点。

“也有必要看到，官僚资本主义是如何由非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组成的；这是贡萨罗区分大资产阶级的两个派系——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原因：避免对其中一者亦步亦趋——我们的政党曾因此有三十年的时间采取了错误的战术。这样理解官僚资本主义是必要的，因为新政权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主义才能最终完成民主主义革命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只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被当作目标，而非国家垄断的资本仍有自由，则大的买办资产阶级会保持经济上的能力来抬头和夺取革命的临到全并阻止进入社会主义革命。

“进一步地，贡萨罗主席还概括说：官僚资本主义不是中国或秘鲁特有的进程，而是遵循**帝国主义者征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的晚期条件**，那时这些被压迫民族还没有摧毁封建残余——更不用说发展出资本主义了。

“综合地说，理解当代秘鲁社会和革命属性的关键问题是这个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符合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的论断。这个成果是对世界革命的贡献，并被我们这些马列毛主义和贡萨罗思想的支持者坚定地坚持着。”

我们完整引用了秘共一大文件《民主革命路线》的这一部分，这是因为这个话题对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者非常重要。同时，在进行民主革命和推翻压迫我们的三座大山上的另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引用同一篇《人民之声》的文章中讨论的毛主席的话：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被这些阶级及其国家政权所压迫和损害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虽然也是资产阶级，却是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到达的地方，对于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蒋介石统治区域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其中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即这些阶级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倾向，他们替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散布幻想，他们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当着他们的反动倾向尚能影响群众时，我们应当向着接受他们影响的群众进行揭露的工作，打击他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使群众从他们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但是，政治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如果混同这两件事，我们就要犯错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

贡萨罗主席正确地提醒我们，列宁进行了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任务，而毛主席则出色地研究和发展的农民革命的道路。贡萨罗告诉我们：“通过转向列宁，我们从工人阶级的概念

中找到了牢固基础，来评判这个重大问题。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教导我们：

“‘但是上面这个图表还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即这种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可以有两种方式。或者是大地产被保存下来，并逐步地成为经营土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这是普鲁士式的农业资本主义。主宰一切的是容克，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容克一直保持着政治上的优势，而农民则处于受压制、受屈辱和贫困愚昧的状态。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

“‘或者是革命扫除地主的地产。这样，资本主义农业的基础就是由自由的农场主经营自由的土地，即清除了一切中世纪废墟的土地。这是美国式的农业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条件中，这种条件对人民群众最有利，因而生产力的发展也最迅速。

“‘实际上，在俄国革命中，斗争并不是为了实现民粹派的“社会化”及其他荒谬主张（这些不过是市侩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如此而已），而是要决定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走什么道路：走“普鲁士的”道路，还是走“美国的”道路。不弄清革命的这一经济基础，就根本不能了解土地纲领问题（马斯洛夫就是这样，他只是研究抽象的愿望中的东西而不说明经济上的必然的东西）。

“‘……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都竭力掩饰土地变革的实质。……立宪民主党人混淆（“调和”）了俄国革命中土地纲领的两条基本路线，即地主路线和农民路线。其次，也简单地说一下：在 1861-1905 年这段时间，俄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农业演进的两种方式，即普鲁士式

（地主经济逐步地向资本主义发展）和美国式（在土地辽阔的、最自由的南部，农民发生分化，生产力迅速发展）……’

“这里巧妙地划出了农村的两条道路——农村是‘革命的经济基础’，我们必须从农村开始，而这是我们绝对不能规避的。但这还不是全部。列宁在这两条经济道路和政治道路之间建立了联系。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说：

‘孟什维克喊道：“资产阶级的国家将会加强。”他们暗地里支持资产阶级君主派（立宪民主党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却拍着胸脯说，在考虑支持谁的时候是把资产阶级共和派也算在内的。客观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向我们提出的真正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是普鲁士式的农业演进，还是美国式的农业演进？是假立宪主义的遮羞布掩盖起来的地主君主制，还是农民的（农场主的）共和国？闭上眼睛不看历史对问题的这种客观的提法，就是自欺欺人，就是象市侩那样躲避尖锐的阶级斗争，躲避对民主革命问题的这种尖锐、简单和彻底的提法。

‘资产阶级的国家’我们是避免不了的。只有市侩才会在这个问题上想入非非。我国革命所以是资产阶级革命，正是因为这个革命并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是资本主义的两种形式之间、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之间、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两种形式之间的斗争。十月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的君主制就是孟什维克诺沃谢茨基所认为的“相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在我国革命中，如果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支持资产

阶级的这一或那一阶层去反对旧制度，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而且我们的确没有前进一步。’

“列宁的这个伟大论断是理解民族民主革命中土地问题的根本；尽管如此，在我们国家，有人觉得这两条道路在今天和当代不再适用。这种想法是十分错误的，并且只会有助于模糊土地问题和粉饰地主的土地措施。可以说，这条道路在今天的新条件下发展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一般性的合作和联合形式的使用。毛泽东出色地研究和发展的农民道路，这可以在《论联合政府》的‘我们的具体纲领’的‘第六土地问题’看到。”

我们希望从贡萨罗主席这些精练的言论和评论中阐明，压迫我们的三座大山是紧密相连的；因此，他们是民主革命的目标，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与它们斗争。民主革命要消灭的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官僚资本主义；它不是针对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针对大资产阶级，包括买办派和官僚派。正如以前多次说过的那样，新型资产阶级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因为资产阶级已经变成了一个腐朽的、过时的阶级，在我们国家，现在和过去都不存在一个有足够力量来担当领导角色的中等/民族资产阶级。因此，正如被压迫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发展向我们表明的那样，其“现代化”遵循地主或普鲁士的道路，缓慢演变为基于大庄园和新式农奴制的资本主义（半封建主义）。这导致了完全服从帝国主义要求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畸形，阻碍了为构成这些国家人民的阶级服务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我们以人民战争的方式完成民主革命，夺取全国政权之前，这

条缓慢演变的道路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它不会像德国那样完成，因为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在我们的情况中，主要是美帝国主义，在其他情况下则是压迫他们的主要的帝国主义）。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官僚资本主义使革命条件成熟，这需要一个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共产党来发动和发展人民战争，完成民主革命。

注释：

[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2]世贸组织、经合组织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全球价值链对贸易、投资、发展和就业的意义（Implications of Global Value Chains for Trad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nd Jobs）》，2013年9月。“跨国公司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实现的业务扩大，是全球价值链的主要驱动因素。这点体现在各国在1990年到2010年间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和该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显著的相关性上。外国机构的作用显然影响着以出口为目的的进口和在各种国际生产网络中的参与程度。”

[3]注释[2]的同一份报告：“在包含多个全球价值链的世界上，建成单一完备的价值链是个艰巨的任务。然而，即便这种做法非最优或做不到，当地政府仍然可以鼓励公司加入已有的全球价值链条，以较低的进入门槛、相对短的耗时、低的成本，来实现出口。确实，这种做法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无需多个公司组成水平生产的工业（生产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而是可以作为出口商来专注于特定的商业活

动和生产任务。例如，生产零件和组件：中国专注于组装电子工业的最终产品并且成为了最大的 ICT 产品出口国；其他国家专注于组装中间产品（例如：墨西哥的汽车子系统产业）；或提供 ICT 服务：印度。”
（第 18 页）

[4]2010 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亚伦·西多在《全球价值链：影响和意义》，（Global Value Chains:Impact and Implications）引用了，加拿大外交国际贸易部，2011 年。

[5]引自注释[4]的 2010 年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

[6]库尔特·许布纳，Der Globalisierungskomplex，调查，柏林，Editorial Sigma，1998 年。

[7]列宁，同上。

[8]汉斯-迪特尔·埃弗斯，Working Paper No.14, Sequential Patterns of Strategic Group Form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系，德国比勒费尔德，1982 年。

[9]埃弗斯，同上，第 13 页。

[10]埃弗斯，同上，第 3 页。

[11]埃弗斯，同上，第 21 页。

[12]埃弗斯，同上，第 22 页。

[13]Patrick Köllner，Japans Technologietransfer nach Südkorea:Entwicklungstendenzen und Problempunkte，第 298 页。

[14]Myeong-Kee Chung , Zur Entwicklung der koreanischen Automobilindustrie(英语: Developing the Korean Automobile Industry), Institu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 e.V.ISF Münchenn, 第 75 页

[15]JM Gerken , 3.4–Fallstudien von taiwanisch-japanischen,Joint Ventures in China,“Vorgehensweise und Zielsetzung der Firmeninterviews.” (英语: 3.4–Case Study of Taiwanese-Japanese,Joint Ventures in China,“Behavior and setting goals in company interviews”)Chapters 1,3-4,2000 年。

[16]列宁, 同上。

[17]列宁, 同上。

[18]

日本实施的对台投资项目数量最多（1952 年到 1997 年共 2991 个投资项目）。外国投资的四分之一来自日本（1952 年到 1997 年共有 74.2 亿美元）。

日本的直接投资总数中有 28%流向电子工业（1952 年到 1997 年的投资总额是 20.2 亿美元）。

台湾地区 8/11 的最终汽车组装生产商以合资的形式与日本企业合作。

台湾地区目前的投资资本总数是 300 亿美元（1983 年到 1996 年），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仅次于香港。这些投资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以来显著增加。

台湾地区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主要根据资本集中，这可以在电子产品和家用电器方面的大量案例里看到。（资本投资额：20.3 亿美元；投资项目数：1991 年到 1997 年共 2778 个）。

关于此，另一位资产阶级学者许布纳说：

“日本不只在韩国和台湾地区投资，而是在整个地区投资：在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日本企业增加了在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投资。得益于日本的直接投资，马来西亚成为空调设备的最大出口国，并且已经成为领先的半导体生产者之一。日本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全球-地区生产网络建设——从战略角度看——有两种：伴随着贷款的直接投资，以及要求用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公开援助。（这种双线战略不只日本在用）.....欧盟也设立了详细的计划来促进在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

(Kurt Hübner, Der Globalisierungskomplex, Edition sigma, Berlin, 1998, pg.180-181.)

许布纳也提到：“直接投资首先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显著驱动因素。平均来说，在 1986 年到 1991 年，这些投资分别占两国国内资本形成规模的 24.4%和 9.7%。

这个趋势在这些国家持续发展至今。各垄断组织和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市场的斗争在加剧，将投资的接受国越来越多的变成帝国主义竞争的地方，通过英属加勒比群岛对台湾地区进行的投资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群岛是避税地，帮助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以间接路线克服在投

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障碍)。也需要注意：荷兰帝国主义掌握的巨大金融力量，如统计数据所证实的。

在 1998 年（亚洲经济危机）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时期的结束给我们提供了下述台湾地区的数据：

台湾地区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总规模在 2009 年是 560 亿美元，当年又有 47.89 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进入，比前一年降低 41%。在这些投资中，19.5%来自美国，17.1%来自荷兰，17.5%来自英属加勒比群岛，15.2%来自日本，等等。在 2010 年，投资的部门主要是：金融和保险部门的 20.2%，电子零件 15%，批发零售业的 5.8%，电子工程的 5.2%和电子通信的 5.1%。（《台湾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台湾地区，基本信息，台北市德国经济办事处。）

在 2012 年，外国直接投资比 2011 年增加了 12%，即增加数额 55 亿美元多。金融部门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仍然是最大的，其次是贸易和电子零件生产等。这年，来自英属加勒比群岛和荷兰的投资占总数的比分别增加了 25%和 21%，低于美国和日本的占比，消息来源仍然是台北市德国经济办事处，时间是 2013 年 1 月 31 日。德国的排位在第 17 位。（More foreign investments in Taiwan, Finance and Insurance in the Center of Interest. Increasing investments from and for Germany,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

从补充数据中可以看到，从 1952 年持续到 1997 年的趋势仍然存在并且数量上有着相应的变化。从逻辑上说，美帝国注意既在台湾也在整个地区的累计投资中领先。日本帝国主义紧随其后，之后是其他

帝国主义国家。然后是（主要是美国的）帝国主义银行主导的业务，包括：银行间转账、债券等、期货、次级贷款、房贷业务等等（这个列表还可以写下去）。

不止如此，必须考虑到，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投资“更成熟且有更多时间来选择投资的战略角度”。从我们看到的来说，美国的统治地位没有动摇，日本的也没有——并且在勾结和斗争中紧随其后；这点，在考察这个地区正在发生的的力量变化时必须考虑到。

[19]More foreign investments in Taiwan, Finance and Insurance in the Center of Interest. Increasing investments from and for Germany,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

[20]台湾地区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根据 2012 年的数据（台湾企业家重新考虑了他们的投资战略。中国大陆吸引力的下降/在台湾投资是一个选项/Jürgen Maurer[German Chamber of Commerce Abroad]）：

“台北（GTAI），2012 年 10 月 9 日.....根据官方统计资料，1991 年至 2011 年，台湾地区获准在中国大陆投资约 1120 亿美元。根据经济部投资委员会的数据，471 亿美元投资于电气和电子行业。但是，根据非官方资料，以及考虑到第三国的货币流通，实际金额要高得多。”

因此，看待“台湾投资”的实际的中介作用很重要。在引用的调查中的 14 个公司的案例研究中，从涉及台湾的部分“日本与台湾地区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动机”中，我们看到：

“比较日本投资者在台湾的主要动力与日本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在中国大陆的主要动力。该案例研究（1998）的评估证实了日本公司在台湾地区投资的主要动力与台湾地区投资者在中国大陆的主要动力一致。二者都受到了目的国廉价劳动力成本，以及获准进入当地市场的驱动。一些日本公司报告，它们通过在台湾地区的子公司，想要在东南亚和中国大陆打开新的市场.....在日本投资者中，他们有着在台子项目投资之外的新计划。小结：比较日本投资者在台湾的主要动力.....有着汽车行业的大项目。”

[20]“3.日本在台子公司的公司结构。

台湾合作伙伴获准参与在台子公司的要点：

日本可以持有<50%的公司股份。

台湾合作伙伴积极参与管理和生产。

在一些案例中，台湾合作伙伴将日本的子企业和谐地整合进入台湾商业协会。（见章节 3.4.2.1，日本厚木台湾汽车零件厂的例子）

最简单地，台方得到了日本的管理技术。他们的下一步是获取特定流程的知识。日方则愿意帮助台方发展他们的组织。台方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获得特定产品的知识。尽管缺少特定产品的知识，但台方可以为该地区提供辅助生产的服务。通常，台方这边有自己独有的客户。”此外，子公司更多的“独立性”或“本地化（台湾化）”，意味着通过资本和管理的分散来扩大和集中母公司的权力（在这个案例里，日本公司，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就是这样来获得世界统治的）。来自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发生变化后，回到日本市场或进入另一个帝国主义

市场，借用产品的低成本特点与在日本或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对手竞争，正如在这个研究里引用的：

1“4.后续投资的发展：从对公司的采访中可以确定地是，日本公司（合资）的合作伙伴台方逐渐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中获得独立地位。台湾地区的合作伙伴和雇工对由日本投资者建立的公司有了认同感。随着吸收特定产品的知识、流程和管理，在所有的子公司都出现了台湾化。子公司在设立是日方参与的越小，则公司的台湾化越快，公司发展出自己的商业策略也就越早。这是说，台方积极完成日方要求的生产，看到了它为自己在中国的投资项目的机会。台湾地区今天的一些领头企业，例如宏碁和新宝一开始是日本公司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合作伙伴和日本产品的总经销商。甚至在今天，这些公司的日本合作伙伴还持有小部分股份。住友贸易持有宏碁的 0.5% 的股份；夏普持有新宝的 8.51% 的股份。这类台湾地区公司迅速吸收了特定产品和流程的知识，并在生产日本产品之外开始发展自己的产品。与日本企业的技术合作和关系使这些公司能够建立自己的第二个基础。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它们逐渐在生产日本之后建立了自己的品牌，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生产网络。他们没有放弃与日本合作伙伴的关系。相反，它们在该网络的分配关系中仍非常密切。日本的市场占有者愿意接收台湾地区的产品和台湾地区在高质量及其和电子零件的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因此，这类企业在商业上的成功，有一部分是基于与日本总公司的合作。然而，这类公司的独立性足够大，可以主动对中国大陆投资，这反过来又加强了它们

相对于日方的地位。”（已经引用的“案例研究”）

我们从条目 6 里可以看得更清楚：“展示的案例证实了这种印象：台湾地区公司在电子电气领域和汽车零件领域已经学会了快速处理小规模订单。为此，它们在中国大陆建立了生产基地”。

那么这些“台湾地区的”公司是怎样在中国大陆运行的？答案是，通过模仿他们的总公司：

“5.将流程和产品的特定技术转移到中国大陆。

转移简单和标准化的产品。

示例案例表明，标准化生产的完全转移正在进行。在一个案例中，这种转移已经完成。台湾地区的最大的公司保留了高价值产品.....

“6.转移到中国的产品和特定流程的技术改进.....在当前的案例里，无法确定产品或特定流程的技术改进。在一些子公司的微观层面上，没有发现劳动力发展的适应过程或改变.....

“7.在中国大陆新成立的台日合资公司的后续投资影响。一些例子表明，中国大陆新成立的台日合资子企业仍然再生产成熟的商品，对日本在台子企业的产品范围来说充分标准化.....大的台湾地区公司如宏碁和新宝将自己的投资项目调整到大公司的典型模式上，即将简单的和标准化的产品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这些产品包括电子零件、外围设备和简单消费品。同时，这些公司将更高质量的副产品保留给总公司所在的国家和地区。”